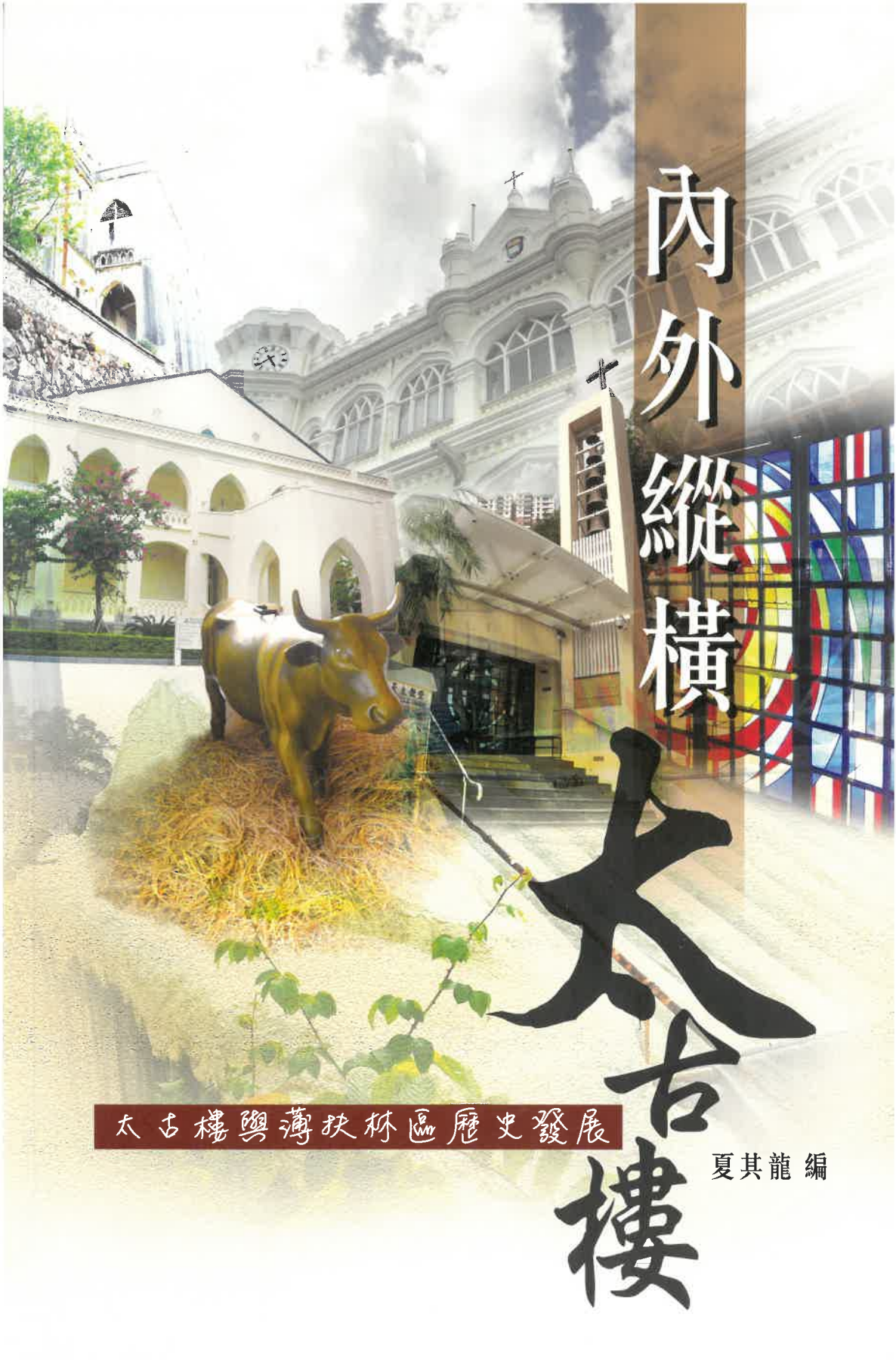

內外縱橫 太古樓

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

夏其龍 編

明之剛神父小傳

林雪碧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圖書館助理主任

一、生平

明之剛（René Marie Chevalier, MEP, 1909-1981）生於法國波普雷奧（Beaupréau, France）一個農民家庭。小學畢業之後，他便在家族的農莊中工作，培養出他堅毅踏實、刻苦耐勞的個性。

明之剛一面工作，一面思考自己的未來。他細心聆聽天主的聲音，後來，他肯定了自己的召叫，甚至明確地指出天主給他的是傳教聖召。於是，他到備修院學習，直至1935年，正式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入會申請表上，他的推薦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虔敬、勤奮、仔細、盡責、機智，具備了作為一個出色傳教士的一切條件。[1]經過7年的訓練，他在1942年領受了司鐸聖職，並獲派遣到中國廣東傳教。可是，當時正值世界大戰，歐亞兩地均深陷戰火之中，令他無法起行，唯有留在家鄉，服務當地教眾。

大戰結束後，明之剛終於可以遠赴海外，履行他作為外方傳教士的使命。經過兩個多月的旅程，他在1946年8月踏上中國的土地，隨即開展工作，獲派駐廣州石室教堂和石龍痲瘋病院。

太平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中國再次陷入戰火中；國共兩黨內戰，迅速波及全國。未幾，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在共產黨統治下，境內外國人的活動受到多方制肘。1951年，廣州教友在石室教堂召開代表會議，議決落實「三自愛國教會」運動。所謂三自，即自治、自養、自傳，意指教會需由中國教友自辦，脫離梵蒂岡的管轄。當時，大批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明之剛亦未能倖免，終於在1952年被迫離開中國，前往香港。

抵達香港後，明之剛旋即被派到露德聖母堂服務。露德聖母堂位於薄扶

林太古樓村內，村民多為納匝肋印書館的工人及其家屬，是香港少數的教友村之一。他非常關注社會事務，組織救濟運動，又協助堂區成立多個善會，並開拓南丫島教務，令傳教事業有長足的發展。明之剛在此堂區服務長達19年，其為人處事之方式受到村民高度讚揚。

1971年，明之剛被調派至香港仔聖神修院擔任神師，分擔教區的聖職培育工作，甚受學生愛戴，堪稱桃李滿門。1980年，再調任西環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其時他雖已屆古稀之年，但仍然致力於社會關懷服務。

1981年4月，明之剛休假返回法國；途經泰國，本擬探訪當地難民，卻遇上車禍而逝世，終年72歲。遺體運返香港後，安葬於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他意外遇難，使整個香港教區為之震動，追思活動不絕；其殯葬禮即由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主持，數十位神父共祭，教堂內坐滿吊唁人士，當中不乏曾受他恩惠的非教友，喪禮極備榮哀。教廷傳信部長羅西樞機（Agnelo Rossi, 1913-1995）亦致函巴黎外方傳教會總會，表達哀思。[2] 眾口一辭，對他稱譽有嘉：「……明神父的肉體雖已不存在，但他的靈魂比肉身高貴萬倍，他已得到永生，他到達了人的目的地—天堂。」[3]

傳教士的首要任務必然是傳教，而當他遠赴異域時，少不得要有冒險犯難的犧牲精神；以下即以傳道和殉道兩方面縷述明之剛的傳教事業。

二、傳道

1. 尊重本地文化

過往很多西方人自視比有色人種更為優越，肩負起改造世界的使命，此即所謂「白人的重擔」（white man burden）。他們輕視其他文化傳統，企圖把自己的風俗習慣強加於人。部份早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眼見當時中國人落後無知，少不免亦帶點優越感，也不曾認真探究中國文化的特質，往往因此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衝突，窒礙信仰的傳播。

明之剛則明白到「為一切人，成為一切」的道理，他給人留下的印象，除了一把鬍子、一個煙斗之外，就是一襲中式的黑布長衫。那是當時中國人的日常衣飾；他從外表出發，讓人知道他雖然是法國人，實則與中國人無異，他願意把傳教地視為自己的家。

明之剛在家，當然要說家鄉話 — 粵語；事實上，學習粵語就是他在中國面對的第一個挑戰。粵語有九個聲調，聲調不同，意義也就不同，譬如「細

路」和「細佬」發音相近，意義卻差距甚遠。同時，粵語中夾雜很多俗語俚語，或者有音無字等困擾。這對他來說，實在異常複雜難學；太苦惱時，他會做些小手工以作調劑，然後又會大聲朗讀中文，繼續那艱澀的課程。他學成粵語之後，常會說：「呢D嘢，係咁架嘞！」用以安慰他人；從中流露出他的心意，就是任何事，總有天主的安排，得失不必看得太重。他生性和善，面對他人惡行，鮮有疾言厲色，只會說：「我話你知，咁樣唔得架嘞！」[4]

1954年5月23日為太古樓村兒童和平日，露德聖母堂舉行了一台中文彌撒，使村民、兒童更能投入禮儀。天主教一直使用拉丁文舉行彌撒，因此很多教友根本不明白彌撒經文的意義；直至60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教會才正式准許使用本地語言舉行彌撒。明之剛並非第一個提倡禮儀本地化的人，在此之前，本地化風潮已醞釀多時，同時教友又對傳統戀戀不捨；他能夠審時度勢，回應教友之所需，對本地化運動亦不無貢獻。[5]

2. 拓展教務

明之剛擔任過多個職務，當中以駐守露德聖母堂最為長久。露德聖母堂位處香港南面，早期往返市區之交通不便，所以自建立以來，教友數目一直不多，發展不大。50年代，大批大陸新移民湧入香港，人口激增，教友人數也相應增多，從當時的3萬多發展至70年代的20餘萬。明之剛配合了牧民所需，亦為應付大量新移民所造成的社會壓力，於是在堂區組織了多個團體，如聖母軍、聖雲先會等，舉辦了多項活動，使整個堂區也充滿活力和朝氣，露德聖母堂一躍而為薄扶林的傳道中心。每年慕道者人數總在百人以上，單在1957年領洗人數即有187人，但是隨著移民潮漸趨穩定，新增教友人數亦告回落，教友總數從1954年的數百人大幅倍升至1957年約1500人，然而直至1964年，亦只有大約1700人。[6]

教友人數增多外，露德聖母堂區的範圍也隨之擴大，包括全薄扶林、雞籠灣、鋼線灣、大口環及南丫島等地。1958年，明之剛前往南丫島傳道，他先拜訪多條村落的村長鄉紳，道明來意，彼此建立友好關係，日後若有信仰風俗問題而產生磨擦也能夠容易和平解決。當時全島只有一個廿多年未參加過彌撒的教友。明之剛先於大坪村租用民居以作聚會之所，招收慕道者；後來則買地創辦露德聖母學校，為當地兒童提供教育服務，亦使居民更能認識教會。明之剛由聖母軍成員、江門聖母聖心會修女等人陪同，幾過多年努力，1969年即有十餘人領洗入教；人數雖然不多，但從無到有，當中變化不可謂不大。[7]每週日，明之剛在露德聖母堂主持上午8時彌撒後，迅即驅車至中環搭乘小輪前往南丫島主持中午1時彌撒，直至黃昏5時，才返回露德聖母堂，又在晚上8時與

教友舉行晚禱。當時薄扶林和南丫島均為交通不便，可以想見往返兩地舟車勞頓之苦，有時甚至還要餓著肚子趕車趕船。[8]

3. 培育聖召

一個教區必須培育自己的聖職人員才會有健康的發展，明之剛在此亦為香港教區培育聖召而作出了貢獻。露德聖母堂的聖召很豐富，最少產生過6位修女和4位神父，當中以明之剛在任時為最多。該堂第一位所出的神父為麥振群，其年幼即矢志修道，後加入慈幼會，並在羅馬晉鐸。[9]聖召之豐富，皆因該堂教友多為納匝肋印書館的工人及其親屬，當中不少人有通婚的姻親關係、代父母的神親關係，彼此關係密切，而紅白二事均以天主教儀式進行，造就了濃厚的宗教氣氛。明之剛上任後，更積極推動宗教活動，組織多個善會小組，每晚必與教友一起進行晚禱，又常聚集在聖母山前誦唸玫瑰經，而每遇大節慶更有退省祈禱，如1965年的堂區主保瞻禮期間，便舉行九日敬禮，同時安排教友避靜，務使教友時刻浸淫在神的氛圍中。[10]

1971年，教區調派明之剛擔任聖神修院神師，這對於露德聖母堂的教友而言，自然是個壞消息，尤其太古樓的村民，更是不情不願，甚至曾上書教區要求收回成命，只是挽留之議未獲批准。[11]聖神修院為香港教區培育司鐸之重要基地，是「教區的心臟」。[12]是項任命讓明之剛直接參與聖召培育的工作。這個「心臟」顯然患有心臟病。當時，正值火紅年代，受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社運、工運非常發達，社會上對權威之挑戰、要求改革之聲不絕；流波所及，教會亦不能免，教友要求教會更直接參與社會事務，神職人員要求教會更深入人群，有些更走到工廠當起工人來，或者質疑修院傳統培訓模式的實用性。另一方面，在梵二精神的推動下，教會在牧民、禮儀等各方面均有所革新；再加上華南總修院與教區修院兩者合併，又把神學課程開放予修女及平信徒修讀，如此，在人事或學制上必然會有重大的改變，當時修生留學羅馬、台灣或在本地進修，也曾爭論過好一陣子。在如此動蕩不安的境況下，明之剛接任神師一職，其中挑戰不言而喻。他負責整個修院的靈修訓練，修生每月與他單獨傾談最少一次，假若修生認為他並非自己理想的靈魂導師，可以另覓合適神師，但若有修生求教，他必會毫不吝嗇地給予幫助。他一直秉持梵二司鐸培育法令的要求：「靈修訓練當與教義及牧民訓練密切聯合，而尤其應於神師之指導協助下實施之，好能使修生學習藉著聖子耶穌基督，在聖神之內，與聖父親密的生活。」[13]他按著自己多年的牧民經驗，為修生提供了不少意見。此外，他年輕時務農，在修院內也經常打理草木，常自稱是修院的花王，至今仍可見其手澤；每週的清潔日，又必會率先動手清理園子，年輕修士看見他做得

汗流浹背，也自覺不能躲懶。他就是如此以身作則感染週遭的人。[14]縱觀他在任9年，並未聽聞修生同袍對他有任何劣評。

三、殉道

明之剛並非為維護信仰而受迫害致死的殉道者，但是他的完全奉獻、甘為他人而忘卻自己之犧牲精神，當可媲美殉道聖人；事實上，他在泰國也是為了探訪難民而遇上車禍，其服務他人與關懷弱小之心，可說是至死不渝。

1. 照顧痲瘋病人

明之剛抵達廣州不久，即奉派到石龍痲瘋病院照顧病人。石龍痲瘋病院成立於1907年，位於東江下游的兩個江心小島，分設男女病院。病人數目由成立之初的數十名，至高峰時多達四、五百。痲瘋病是一種高傳染性的疾病，可使病人容貌扭曲，肢殘體缺，極其可怕。因此，很多病人遭到親人遺棄，而其時政府也派有軍人荷槍實彈駐守各個要道，防止病人進入市集。可以想見，病人不但要承受肉體上的痛苦，其心靈之傷痛更是難受。

當時願意到病院工作的人並不多見，政府亦鮮有資助。在人力物力俱缺的情況下，經營實在不易。故此，在那裡工作的人，都必須親自處理瑣事雜務，無不感到工作繁重；自創院之始，多位負責人每因工作過勞或感染痲瘋而病死，如創辦人比利時籍的江神父，就因為染上痲瘋病致死。[15]1947年，明之剛接手管理病院，便似是抱有殉道的決心。他十分同情病人，親近他們，為他們洗腳換藥，不怕髒臭，不懼傳染。他不但照顧病人的身體，還醫治他們的心靈，讓他們在可怕的疾病中，仍然有尊嚴地過活。[16]

2. 組織堂區善會

明之剛為露德聖母堂籌辦了多個善會組織。早年香港社會福利不全，一般民眾生活艱苦，經濟出現問題時，往往求助無門。而他至為關心勞苦大眾，因此他所倡導的組織，多以援助大眾為宗旨。

1955年成立聖雲先會。該會為世界性組織，宗旨為幫助有困難的人士，不分宗教與國籍。該會給予的援助金額不多，但總能表達支持的心意。[17]

1958年成立聖若瑟會，旨在招收堂區教友守望相助。該會要求會員繳交會費，集腋成裘，用以幫助有急需之會員；遇有會員離世，其他會員每人須捐助1元給其家屬，作為殮葬之用，並緩解燃眉之急。[18]

60年代，香港多家華資銀行，如廣東信託、遠東、恒生等相繼發生擠提，市民對存款於銀行之信心不足。儲蓄互助社則為國際性運動，遍佈多個國家，目的是教導社員積穀防饑，以股份的方式在社內儲蓄。互助社會把社員的儲蓄貸款給其他社員，幫助其應付經濟困難，改善生活。明之剛協助該社在區內成立，先後有露德及華富村兩社，對象擴及非教友。[19]

3. 參與社區服務

明之剛所關心的對象，絕不限於教友，他關懷所有人。他在1952年中才抵達香港，未及一年即爭取興建診所，服務區內市民。後來他在薄扶林村購得一地，正要落實進行；但是，薄扶林村民以該地毗鄰靈塔廟，對神靈不敬，反對計劃，幾至釀成太古樓村與薄扶林村兩村村民武力對抗。後來，薄扶林村的一名嬰孩患了急病，被修女醫好，反對之聲才平靜下來，診所得以順利建成。診所收費從廉，一星期要診治的病人多達2000。可惜由於人手不足，其後診所停辦，原址改作圖書館之用。[20]

此外，無論如何忙碌，明之剛每星期總有一、兩天走訪醫院探望病人，一如他對待痲瘋病人，要讓他們在病苦中得到一點安慰。他從不以此為苦，更視之為愉快的旅行。[21]他走進大口環兒童醫院，病童便會圍著他，要求他講故事，有的坐在他膝上，有的甚至爬到他背上去。當他探訪肺結核患者時，同行的人往往遠遠避開以免受到傳染，只剩他一人與患者聊天談笑。[22]他對病弱者的關懷，絕對發自內心，也感動身邊不少人。當他離世後幾個月，聖母玫瑰堂成立「醫院探訪組」，繼續他的愛德工作。[23]

面對經濟艱難的市民，最直接有效的就是贈送金錢物品；當時，香港多個慈善機構都會向窮人派發救濟品。明之剛向富裕人家募捐物資，然後轉送窮人。求助者眾多，他一視同仁，不分教內教外，均親自派發。遇有老弱行動不便者，則把救濟品送往其家中，務使人人不受飢寒煎熬。他又為失業者介紹工作，襄助貧苦兒童入學，儼似萬家生佛。[24]

4. 和善克己

明之剛在香港主要服務過3個機構：露德聖母堂、聖神修院及聖母玫瑰堂。前文提過他在動蕩中擔任聖神修院神師一職。其實，他在接任兩堂主任司鐸之職時，兩堂亦發生過一些人事糾紛。1952年2月，太古樓村村民上書教區，狀告露德聖母堂時任主任司鐸與女教友發生曖昧關係，要求撤換；[25]明之剛走馬上任後，卻得到村民教友的熱烈愛戴。1980年，他繼任聖母玫瑰堂主任

司鐸時，該堂區之善會、委員會等不下20個，各會積極為堂區服務，但卻經常只以自己為重，從而與其他小團體產生磨擦，整個堂區的氣氛並不和諧。他上任後旋即找出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提出「堂區一家親」的新路向，促使各會從各自為政走到以堂區為重的一面。[26]明之剛在該堂服務不到一年而辭世，但該堂多年來沿用「堂區一家親」口號；例如2004年訂為堂區主保月主題，2005至2007年訂為堂區年度目標，明之剛之影響可謂深遠。

明之剛善於化解糾紛，並非由於他能言善道，除了是由於他天賦的親和力之外，更由於他身體力行為眾人所立下的榜樣，令人折服。首先，他對人親切友善，並不容易動怒，臉上總帶著一絲笑容，讓人如沐春風，也讓人看得見作為基督徒的平安喜樂。第二，他對人慷慨，自己在生活上卻儉樸無華；他會花錢購買新棉襖送贈學生，自己卻長年累月穿著同一件破舊長衫；[27]他向窮人分送物資，自己吃的也不過是清水煮菜。[28]第三，他勤勞用功，言行一致；除了經常探訪教友和病人之外，他更會動手處理人所厭惡的工作，例如清理小動物屍體、疏通淤塞渠道、修剪雜草、栽花種樹等。此外，他自己雖然工作繁重，但從不說「忙」；也教導後輩，作為神父必須要有一顆「得閒」的心，隨時準備接待他人、了解他人的需要。[29]

四、結語

明之剛沒有做過扭轉乾坤、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他只是一步一腳印的做好份內事，更不怕麻煩，不怕艱難地做好有益於人的份外事；以致逝世超過30年，但仍然讓人感念至深。縱觀其鐸職生涯，或可得出幾個重點：一，真正的牧者；他為人並不多言，不會向人講論長篇道理，他不是佈道家；他沒有留下文章著述，不會向人介紹深奧的神學教義，他不是神學家；然而，他與人分享的都是自己的生活體驗，絕不空泛虛浮；而且他能體察別人的需要而予以幫助。二，照顧弱小；他竭力救助窮人，扶助被社會被親人遺棄的一群，讓他們在身體和心靈上都得到安慰。三，寬仁克己；他待人以寬，但律己以嚴，把一切最好的都獻給有需要的人。四，全然信靠天主；作為基督徒，作為神父，他生活的核心就是信仰；堅定的信仰令他著實效法耶穌愛人的情懷，讓他無懼險阻，坦然面對困難，而且，也是他喜樂之源泉。

世上無完人，相信明之剛也有著人性的弱點，可是在現存資料中，卻無從得見；無論在他生前死後，他的堂區教友、學生或同袍對他的評價都是正面的。或許，在他待人以誠、無私奉獻的巨人身影中，他性格上的缺點或行為上的偏差都變得毫不顯眼。事實上，他生前即享有「大聖人」之美名，足見他的

思想、言論、行為均得到他人的充分肯定，而每當聽到此一稱呼時，他總會謙遜敬謝。[30]今且以一「王」字總結其一生：頭頂青天，腳踏實地，居中者則與人為善，天下所歸往也。

---

1. "Le Pere Rene Chevalier", Voir carte, nos 4 et 5, pp. 40.
2. 同上，頁51。
3. 鄧美月：＜我們的校董：明之剛神父＞，《公教報》，1981年6月5日。
4. 劉尚遜：＜老牧者不死＞，《公教報》，1981年5月8日。
5. 蔣耀東編譯，張慧珠譯：＜露德聖母堂的歷史＞，《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香港：露德聖母堂，1983），〔頁4〕。
6. "Ratio Spiritualis", obtained from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Section I Box 7 Folder 5.
7. 達彌爾：＜明之剛神父與南丫島的歷史＞，《公教報》，1976年2月13日。
8. 屈鏞：＜舊憶瑣記＞，《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1〕。
9. ＜百年來聖召初葉，露德堂大事慶祝，麥振群神父晉鐸回港＞，《公教報》，1968年8月30日。
10. 陳志明口述訪問，2011年9月；另見＜露德聖母堂區，十四日慶主保＞，《公教報》，1965年2月12日。
11. 屈鏞：＜舊憶瑣記＞，《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2〕。
1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司鐸之培養法令》（台北：鐸聲月刊，1966），頁6。
13. 同上，頁7。
14. 藍：＜師＞，《公教報》，1981年5月15日。又見關傑棠：＜牧者：悼念明之剛神父逝世一週年＞，《公教報》，1982年4月23日。
15. 東莞石龍鎮人民政府編：《石龍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頁599-601。
16. 劉尚遜：＜老牧者不死＞。
17. ＜聖雲先會＞，《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9〕。
18. ＜聖若瑟會＞，《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32-33〕。
19. ＜華富村儲蓄互助社＞，《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8〕。另見《公教報》，1968年3月15日。
20. 蔣耀東編譯，張慧珠譯：＜露德聖母堂的歷史＞，《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4〕。
21. 傳兒：＜爺孫情懷篇＞，《公教報》，2001年4月22日。
22. 劉美寶：＜我的本堂神父＞，《公教報》1965年7月30日。
23. ＜西環聖母玫瑰堂的愛德服務＞，《公教報》1981年9月1日。
24. 屈鏞：＜舊憶瑣記＞，《露德聖母堂：新堂落成祝聖紀念》，〔頁21〕。
25. Letter to the Bishop, 1952.2.25, obtained from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Section IV Box 7 Folder 2.
26. 姚崇傑：＜牧職團的話＞，《西環聖母玫瑰堂卅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聖母玫瑰堂，1983），頁7；另見羅國輝：＜初戀＞，《聖母玫瑰堂建堂金禧》（香港：聖母玫瑰堂，2003），頁49。
27. 周景勳：＜今之聖＞（未刊稿）。
28. 宛瑕：＜我們的明神父＞，《公教報》，1981年5月22日。
29. 姚崇傑：＜給明神父的信＞，《公教報》，1982年4月23日。
30. 劉美寶：＜我的本堂神父＞。

一個社區工作者眼中的明之剛神父

冼昭行

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團隊主任

過去一年，明愛團隊在薄扶林村搜集村民的口述歷史，嘗試掌握這個港島上獨特的歷史聚落的過去。工作過程中，不時聽到村民憶述與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明之剛神父的相處經歷。明神父1952年從內地退回香港，旋即獲白英奇主教委任為薄扶林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他任內推動堂區擴展慈善服務，及至包括薄扶林村在內的周邊社區，向區內社會下層平民提供教育、醫療、救濟及諮詢等服務。本文嘗試為明神父留下一個印記，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個從法國遠道而來的傳教士，是如何心懷社會關懷、開創性與決斷心，在海島一隅一個非天主教社區內開拓一番慈善事業。

一、明神父面對的時代背景

1941年12月24日，香港抵禦日軍南下的防線已全面崩潰，時任港督楊慕琦被迫投降，香港歷經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這段時間香港遭受戰火洗禮，人命傷亡無數，城市建設遭嚴重破壞。單以薄扶林一區為例，日軍侵襲就曾進行連串轟炸，相信是為了消弭英軍的防守力量與確保掌握港島西部航線通道咽喉的博寮海峽，不少薄扶林村居民被炸死或慘遭掃射。[1]伯大尼及納匝肋修院的法籍神職人員被驅逐，[2]兩幢建築物被日軍據為高級軍官住所，以收盟軍不炸聖所之效。[3]日軍亦有進入薄扶林村及太古樓等聚落搜刮家禽、豬隻、日用物資，致令人人惶恐不安。戰事後期，美軍戰機反擊，亦沿薄扶林道投放炸彈，薄扶林村再次受到波及。就近的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寓所The Lamma View亦遭炮彈擊中，戰後擔任牧場經理的積臣（Peter Cyril Jackson）差點被炸死。[4]

當時薄扶林村不少村民避戮回鄉，惟原居民以此為家，在這裡渡過整個淪陷時期。日軍進行白米配給，每人每日只配給六両四，白米之外糧食供應短缺，不少村民因而要捱餓，能夠以苦力賺到一家日日有米飯食已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5]曾有一單親婦人更要走到牛房撿拾溝渠裡沾了牛糞的米糠碎粒回家洗淨來吃。[6]

1945年8月，日軍投降，香港重光。原有英國管理層重新接管牛奶公司，並聘用大量工人，包括不少從內地回港的勞動力。地區人口隨此而增加，惟牛奶公司卻只提供少數單層平房宿舍，故此不少工人在薄扶林村後山搭建木

屋，或租下村內房舍，或屈居在公司的牛棚之中。[7]村內人口驟增，部份原有農地建起屋舍，豬欄亦改裝來住人，居住環境漸趨惡劣，全村只有兩條自來水街喉，供應三千多人使用。

那時候社會權貴仍以英國人為主，華人當中只有少數大族名門才能躋身而進，社會上下層普遍區隔。在這樣的氛圍下，由於牛奶公司管工多聘用英人或俄人，他們與本地工人的僱傭糾紛亦易引起種族之間的隔閡。社會現實裡雖未容排外，惟心內隔膜亦在所難免，譬如有不少村民慣以「紅毛鬼」或「鬼頭」等帶貶義的字眼稱呼西人。[8]當時政府在民生管理上較今天鬆散，村民希冀當局改善居住環境的話，亦時有投訴無門之感。因而部份民生議題要由一群熱心村民透過尋找不同渠道的幫助去啟動當局關注，就如1948年註冊的薄扶林村小學，就是為了回應村內急切的教育需要，由村民自行發起籌辦，經胡忠家族襄助才辦成，後來才交給政府管理，成為官校。[9]建校的歷練培養村內熱心鄉紳處理地區事務的信心，他們亦累積相當的經驗。

具有左派背景，由牛奶公司工人所組織成的港九牛奶公司華人職工會，同樣在1948年註冊成立村內的第二所小學，專收牛奶公司工人子女。[10]時任港督葛量洪在其回憶錄裡透露，當時港府極力防範左派團體辦學，並從中鼓動民眾進行顛覆港英政權的活動，因而在全港各處皆打壓左派學校，學校為此關閉，教職員甚或會被逮解出境。[11]薄扶林這所子弟學校亦遇上相若的命運，1955年初註冊遭取消，教育司署頒令停辦。學生獲安排轉移到新成立的薄扶林官立小學。由於官立小學學位不足以同時應付薄扶林村小學與牛奶公司工人子弟學校的學生，故此1951年已建校的太古樓聖華學校剛好滿足了社區上的教育需要。

由此可見，薄扶林村在1950年代，已經不是單純的農村，而是一個內在存有既定風俗、習慣、信仰、權力結構及處事方針的小社區，並同時有能力回應環境變遷，逐步建立起與官員周旋所需的新經驗，惟因人口湧進而帶來的居住環境質素下降、教育需求、健康知識落後帶來的醫療需求、貧窮人口增加等，皆成為當時這小社區需要面對的新挑戰。明神父要開展服務這村落，便得先應付村民對西人的心理排斥、要應對管理村落的鄉紳主事人、要令到剛毅倔強的村民接受援助，要照顧貧窮所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在在都是相當困難的。

二、一個外來人介入社區改變

五十年代伊始，回應地區人口增長，薄扶林村更逐步由農村發展為地區

的商業樞紐，當中尤以歷史最悠久的大街為中心。從村口走到大街盡頭約一百公呎長，那時候已有六間糧油米舖、四家理髮店、士多、茶檔、涼茶舖、文具店、洋雜貨店、蘇雀館等等，還未數算村口街市賣豬、雞、菜、魚等商販。每月三號及十八號，因著牛奶公司發工資的日子，村內大街兩旁店舖門前更會堆滿從別處進村擺賣的小販，令薄扶林村成為一個有規模的市墟。[12]因此從鋼線灣、新地、草寮、大口環、太古樓等遠近華人社群亦會到村內檔口店舖光顧，成為地區內的一個人流焦點。相信這亦是為何明神父在到埗之初，便選擇先介入這個鄰近堂區的小社區，並在內推行慈善及傳教的工作。

村民都深刻記得，這個陌生的外來人每星期也有三數日走進村來，高大的他入鄉隨俗地穿起一襲黑長衫，面頰上蓄上一絡白鬍鬚，手持煙斗，面常帶笑，溫軟的手會執著孩子的小手，更重要的是，能說得一口廣東話。[13]一派和善的形象，很快便替明神父跟村民建立起信任基礎。他跟村民逐漸認識下來，並沒有急於宣揚福音，而是細心關顧村內居民的需要。他並沒有隨俗般套上村民的眼光去看這個居住環境，去把艱難都「習慣」下來，而是以一個外人的角度去觀察，去發掘出可改善的地方並促進居民改變。從政府檔案資料便見得到明神父支持村民向水務署爭取加裝街喉的信件。[14]

那個年代華人求職，尤其是向政府部門及大公司企業，是須要請薦人館代寫推薦信，或要有保薦人介紹。明神父作為一個通曉英文的西人傳教士，他替不少村民寫過這樣的推薦信，讓他們能夠找到不錯的工作。[15]另一方面，他上任後在堂區成立多個善會，與教友合力去服務區內貧困戶。村民記得每週可領取食物的救濟，每個家庭可獲發麵粉、牛油、芝士等食糧，更有家庭為此選擇送子女到聖華小學就讀。[16]

明神父到任後決定開放剛落成不久的聖華小學及其幼稚園予來自非天主教家庭的兒童，讓他們能夠獲得便宜而又有質素的教育。與官立學校兩者相比較，不少薄扶林村民會認同法國修女的嚴厲治學風格，而交子女上去入學。這一措施，亦廣泛地令到薄扶林村人認識天主教會的工作。親和的形象，加上一連串的實質工作，令不少薄扶林村民對明神父油然生敬。

而象徵意義更大的就是在薄扶林村內建起太古樓診療所。1953年初，明神父已伙同婦女教友在村內空地為村民進行簡單診療的工作，同年五月他致信白英奇主教，求主教首肯向地政當局申請取用薄扶林村內一幅官地。[17]這幅官地座落村口位置，毗鄰村內其中一個重要神壇 — 伯公壇。

客家人對土地神相當敬重，視之為家中長者，故尊稱伯公。每條客家村落必會在其村頭村尾各置一個伯公壇保祐上下平安，亦有標示地界之用。所以

村頭的伯公壇是其中一個風俗與信仰上的重要地標。在其旁邊建起天主教建築物，或會引起傳統觀念固牢的村民不滿。為此，明神父、修女與堂區善人先在這裡積極地贈醫施藥，救助傷患，更親自驅車運送重病者到瑪麗醫院，逐漸讓不滿的聲音靜下來。在這個基礎之上，明神父在其往後近二十年的日子裡，都一直獲得村民的接受與敬重。後來每到禮拜日他也會到診療站內主持彌撒，信徒擠滿了兩層高的小樓。[18]

明神父在薄扶林村的慈善工作，事先並沒有清晰的大規劃，也沒有定下指標要完成多少功績，可他維持定期進村探訪，從村民口中探知社區上的各項需要，並階段性地，一件一件的推行計劃，為薄扶林村帶來實際的改變。村民追隨他處理事務，從他身上學習這個外來人的處事模式，而在日後自行促進生活的改善。這樣的能力與信心培養，為薄扶林村累積力量，有利日後整體發展。薄扶林村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進入了她的黃金時期，商業蓬勃，社區活力滙聚，居民組織逐一成立，村民的獨立性格與開創性，相信受明之剛神父影響者亦不少。

---

1. [日軍殺害薄扶林村民] 村民甘秀卿於2012年5月12日訪問中提供。
2. [神職人員被驅逐] 參考：Le Pichon, Alain. 2006. Bethanie & Nazareth: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HKAPA. p. 128.
3. [修院被據為軍官宿舍] 村民歐陽煥於2012年6月8日訪問中提供。
4. [不幸積臣] 該次轟炸後積臣給喚作「不幸積臣」。參考：The Dairy Farm Company. 1986. The Milky Way: The History of Dairy Farm. Hong Kong. p.131.
5. [日日有飯食] 村民黃彩娣於2012年3月14日訪問中提供。
6. [牛房拾米] 村民鄭惠英於2012年5月29日訪問中提供。
7. [當年牛奶公司工人生活狀況] 參閱1950年2月10、11、14及21日的南華早報專訪。
8. [「紅毛鬼」與「鬼頭」] 村民吳江乾與魏國雄分別於2011年9月16日及2011年8月5日訪問中提供。
9. [成立薄扶林村小學] 村民高貴福與魏國雄於2012年7月3日及2011年8月5日訪問中提供。
10. [牛奶工會成立子弟學校] 參考港九牛奶公司華人職工會成立四十週年會刊。
11. [防範左派學校] 記載於葛量洪回憶錄，參考：Grantham, Alexander W. 1965.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KU Press. p. 115.
12. [薄扶林大街的興旺] 村民盧旺興於2012年5月10日訪問中提供。
13. [明神父和善形象] 村民關惠嫻於2011年12月31日訪問中提供。
14. [爭取加裝街喉] 1955年6月27日明神父去信水務署陳述村內3-4千名貧窮村民活在缺乏食水的環境，希望當局加建街喉及減收按金外的附加費用。詳見政府檔案庫檔案編號：HKRS 287-1-814第109號文件。
15. [代寫保薦信] 村民高貴福於2012年7月3日訪問中提供。
16. [派發救濟品] 村民吳江乾於2011年9月16日訪問中提供。
17. [向主教提出申請使用官地] 香港教區檔案處藏一封日期為1953年5月28日由明之剛神父致白英奇主教的信函。
18. [診療站舉行彌撒] 村民魏國雄於2011年8月5日訪問中提供。

「內外縱橫太古樓」圓桌會議主題文章回應

林杰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碩士及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今天有機會在此回應之前各位講者精采的報告及與各位師友交流，實在深感榮幸。

丁新豹教授生動地把太古樓放回香港十九至廿世紀歷史及香港整個城市的環境及發展，生動巧妙地把太古樓結合了薄扶林區在香港的歷史、地理、飲食、商業及宗教發展。牛奶公司、太古樓和巴黎外方傳道會的互動關係，緣起薄扶林區的地理環境及大家工作上的共同難題，並非傳統的宗教信仰，亦非純為利潤的商業合作，為時數十年，尤為生動寫實。這尤其反映昔日香港社會較為包容、敦厚的民風，不同社群同舟共濟的一面。

丁教授注意到1953年巴黎外方傳道會淡出香港，印書館結業。1954年尾，香港大學向巴黎外方傳道會購入納匝肋修院，改作大學堂宿舍。我特別想在兩件事之間插入1954年3月至5月 ，法國在越南奠邊府戰役戰敗，其背景是自1946年起一直時續的法越戰爭。奠邊府戰役是其中決定一役，法國戰敗後開始退出越南，之後再退出柬埔寨和寮國。印支半島這一連串戰爭和政局動盪，自1946年持續至1975年。而自1885年至二次大戰前，巴黎外方傳道會一直以香港作為支援整個中國和東南亞工作的印刷及後勤基地，這亦正是太古樓的起緣。置身1946至1950年代的政治局勢，巴黎外方傳道會以至所有天主教團體都不再可能在印支半島和中國內地工作。相信亦因此巴黎外方傳道會才在1953及1954年先後決定淡出香港和賣出納匝肋修院。

這段背景對明神父和太古樓有幾點深遠影響：

1) 明神父並未有隨巴黎外方傳道會離港，一直留在香港服務和工作。回想上述50及60年代的地區局勢，應會對明神父構成極為沉重的心理壓力。但他依舊長年熱心工作助人，以平常心過簡樸生活，實在反映其宗教信仰及個人修養的深厚。

2) 太古樓當時的成年居民，相信同樣感受到期間政局的動盪不安。透過明神父和他們的努力，大大減少了在生活和精神上的不安和擔憂，令太古樓上

常常祈禱，事事感恩

梁素玲

太古樓 — 一個我小時候居住的小村莊、一個全是天主教教徒的宗教村，因此除了讀書之外，參加善會就是我們的課外活動；由童年時開始參加聖嬰會、樂鋒會、直至青少年時的聖母軍，都令我留下深刻的回憶。回想起在聖母軍的日子，大家一起在聖母山掃樹葉，在輔祭房為聖爵打蠟，在神父辦公室做麵餅（未祝聖之聖體）、當年的麵餅是由我們每星期新鮮製造的，彌撒中讀經，售賣聖物，探訪弱智兒童中心及老人院舍等。

猶記得當年已經有公教報訂閱服務，我要每個星期五晚派發到他們家中，其實派往第一、二座是沒有問題的，但每次派至新屋（即第三座）時，問題就來了，新屋實在太多惡犬，每次我都要左閃右避，在梯級間上上落落或者要從後門轉一個大圈才可到另一個門牌派發。克服困難、完成工作，此經驗令我終身受用。

探訪醫院也是聖母軍的工作，因此我有機會跟隨明之剛神父到大口環醫院探訪。記得第一次踏入病房，所有病人都急不及待要跟明神父談天，從他們臉上的笑容、眼中的信任來看，可見明神父深受教內外人士尊敬。我親眼目睹他站在病床旁細心、關懷地問候病者，這份愛心令我留下深刻印象。還記得有一次當我們剛踏入病房，有一個病人指著另一張床說：「他走了。」當時我呆著哭了，明神父輕按著我的頭說：「爲他祈禱吧！天主聽到的！」及後明神父被調派到聖神修院，在緊接下來的幾位神父的帶領下，我們更加聯同華富村及西環的教友一起探訪；繼續宣揚天主的愛。

太古樓 — 一個團結的大家庭。我們一起參與聖誕節及復活節的宗教禮儀，一起慶祝農曆新年及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一起爲新生嬰兒領洗而歡欣，一起爲亡者的離去而哀痛。記得我們除了要參與安所彌撒外，更要連續一個星期的晚上聚集在亡者家中，一起誦念「煉獄禱文」，往後的每個星期還要誦念一遍，直至第七個星期才完結。爲煉靈祈禱，安息主懷！

當想起太古樓，便會想起很多人和事，想起我們慈祥的爺爺明之剛神父。一件黑布長衫、一支煙斗、一雙很大的手、臉上的微笑、每一句留給我們的說話，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受他深深影響著。我已經習慣每天祈禱，念玫瑰經，因為我堅信明神父的話 —「信賴天主，常常祈禱，事事感恩，天主定會開心！」

仁愛在我心

明神父與太古樓

口述：符多祿 / 訪問及撰文：鮑慧賢

自從明之剛神父從東莞來港、於一九五二年繼任韓神父出任露德聖母堂堂區司鐸，就成為符多祿銘記在心的仁愛師長。

不嫌骯髒，親自通渠

印象中的明神父待「太古樓人」慈愛猶如家長，每逢老人家生病必定親到他們家慰問甚至守夜照顧，也特別疼錫小孩子。多祿憶述童年片段，道：「明神父不單照顧我生病的媽媽，我十歲時家貧只睡舊帆布床、蓋一張薄毛氈。神父看到立即說這樣不行！天冷小孩子睡覺吹了風、很易冷病！他堅持拿張厚氈給我保暖，更親自蓋在我身上。」

多祿又記起十多歲時，太古樓的住戶將天井放柴的地方改裝為廁所，從家中接駁一條管排出污物到公共溝渠。當年這樣的環境其實很不合乎衛生，坑渠更會時常淤塞。這時明神父竟然不怕污穢惡臭，親自「下渠」清理齊腰的廢物。多祿道：「我們一班好奇圍觀的小朋友不知怎樣幫忙，神父卻說這兒很骯髒，叫我們快去玩、由他自己一人通渠。相信沒有神父能做到像他一樣，對大家像子女般疼惜。」

孜孜不倦，捨己助人

太古樓本身是教會租用給八角樓（納匝肋印書館）職員的宿舍，多祿跟太古樓很多家庭一樣，父親在印書館做印刷鉛鑄，自幼信奉天主教。根據粗略統計，太古樓的登記戶口約三百多，都住在三排共大約四十八間房子中。明神父平日除了為大家開彌撒及上門探訪有需要的住民，也做大量的服務工作。多祿記得，明神父開一輛法國外方傳教會給他用的小福士，駛到大口環、瑪麗醫院四處探望病人。多祿相信，明神父孜孜不倦、忘我助人的精神，啟發後來聖母軍的成立，帶領更多人主動關懷病患者。

多祿與太古樓人心目中的明神父，更常常為了幫助別人傾盡自己所有。多祿記得曾親眼目睹明神父掏盡口袋的五塊錢接濟一個向他求助的人。無論遇上什麼事，明神父也從未曾動怒罵人。

處世精神，凝聚信仰

他的仁慈好像播下了信仰種子，培養太古樓小團體，藉著組織各類型活動不斷成長。後來鄧德成參與聖華學校成立的「樂鋒會」，教區由1858年－1958年為紀念100週年舉辦主教盃足球比賽，當時明神父和岑神父在任內都帶領教友積極參與，結果他們堂區奪得冠軍，取得主教盃。後來多祿與周趙誠組織青年會足球隊繼續參與足球活動，均取得很好的成績。這些都是一些無型聯繫，即使太古樓消失了，仍然繼續將大家聚集在一起。

大至團體，小至個人，大家早已將明神父的言行視為成長處世的模範。多祿道：「我從神父學到比我小的都是弟妹，所以我從不欺負或戲弄他們，反而處處幫助維護。路見不平，對所有弱小的關愛，是明神父對我的影響。我也從明神父身上學習到一份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耐心，使我們太古樓與附近一帶草寮與薄扶林村的村民也能夠融洽共處，即使日常生活有磨擦也忍耐，本著待人和氣的心好好溝通，一起解決。」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口述：何燊培 / 訪問及撰文：周嘉琪

現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的何燊培，閒時回港都會探望一班太古樓街坊、聚聚舊。說到太古樓，燊培叔便滔滔不絕起來。還未搬進太古樓以前，燊培叔已經常出入這個地方，因為他在戰前約1938年起便就讀聖若瑟女校（編者按：他是女校男生），即後來的聖華學校，當時教師都是來自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從小便聽修女分享聖經、道理，搬進太古樓以後便順其自然地信了教。」燊培叔回想說。於一九四一年搬進太古樓的他，從太古樓這個信仰村的氛圍下，便漸漸多參與堂區的服務、加入善會，例如是聖母軍和互助社，後來更變得十分積極，同時跟明之剛神父的關係更加密切。

「明神父的德行和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的教導我還記憶猶新。在善會裡工作，跟他接觸很多，有好幾次的探訪與義工活動，他都樹立很好的榜樣。」

燊培叔猶記得有一次到南丫島探訪貧困的人，當時有一位老婦人病得厲害，明神父親自幫手抬著婦人從她的家走好幾條村、再乘船出香港醫治。他親力親為的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

又一次，燊培叔親眼目睹明神父那份不捨棄窮人的愛，讓他大為震撼：「那時我開車送明神父回太古樓住所，那一刻村內正有兩位等候他幫忙的人，一位是穿著光鮮、富貴的男子，而另一位是等候施捨的老婦人。明神父看到這個情況，在沒有考慮的情況下，先走到老婦人跟前，嚷著請她等一等，然後立即走到有錢人前，同樣請他等等，便回到婦人那處，盡力把身上的錢都掏出來，最後他身上雖然只有五元，也全部給了那婦人，並給她米糧和衣服。

燊培叔說明神父另一次捨己為人的表現，是發生在痲瘋病村裡的。當時痲瘋病非常流行，而大口環當時設有痲瘋病村，明神父會時常探望那裡的病人。燊培叔說：「明神父不但沒有嫌棄他們，還親自為他們洗腳，就像耶穌為十二門徒洗腳一樣，表現愛人如己的精神。」

而燊培叔又認為明神父不理自己的身世，總願意先幫人後才考慮自己。「記得有一個夏天他要回法國探親，於是我們便給他買了新衣服，好讓他光光鮮鮮的回家。要不是聖堂彈琴的翰伯告訴我們，也不知道原來明神父平常穿的內衣很多都破舊了，但從來不提，也不刻意更換新的。」

桑培叔說令他十分尷尬的，是有一次屋外的污水渠塞了，而家裡的人又上了班，於是他的外母唯有請明神父幫手。「我回家時看見明神父把兩袖拉高，動手通渠，我真感到不好意思，但看得出他連我們日常的生活也照顧周到。要再數這樣的例子也不難，我想很多太古樓人提起都會心微笑，就是漏夜請他開車送孕婦到醫院產子。」

雖然明神父於七十年代離開了太古樓，但桑培叔仍繼續活躍堂區及教區的活動，秉承明神父的服務精神。

從天堂來的善牧

明神父與我的童年

口述：陳佩珍 / 訪問及撰文：鮑慧賢

家中共十兄弟姐妹、排行最大、七弟弟為陳志明副主教的陳佩珍，視明之剛神父為愉快童年時代的信仰牧者。

親和關愛，助人為本

來自公教家庭，出生三朝就受洗禮的她憶起當年認識明之剛神父的緣起，說道：「當年韓神父離開我們堂區之後就由明神父接替。第一印象是這位年輕神父相當之和藹可親，尤其喜歡小朋友。他不但慈愛關懷小孩子，也特別照顧老人家。」

佩珍記憶中明神父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因此比上一任的韓神父多一份難以形容的親切感。「韓神父對我們小孩子是嚴格一些，對成年人嚴禁賭博。明神父則比較容易溝通。」親力親為亦是明神父的本色，太古樓哪一家有什麼困難或需要幫助，哪裡就有明神父的身影。

仗義助學，循循善牧

至於佩珍一家與明神父的淵源，更是令人難忘。弟弟今天成為副主教，她深深感謝當年明神父這位牧者的帶領。此外，佩珍父親獨力工作維持一家多口的生計，明神父為了讓窮困家庭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親自負擔起佩珍聖華小學每月兩塊半的學費，免得佩珍因家境問題退學。明神父更同時資助堂區其他孩子上學，寧可自己節衣縮食，足見他滿溢的愛心。

佩珍一家不少親戚是神職人員，因太公在納匝肋印書館工作而自幼居於太古樓。想起從前的日子，她記得自己的家住最多人，後來叔叔結婚成家立室也搬來一起住，人丁興旺。今天太古樓不在了，太古樓之友卻依然時不時將大家聚首一堂。佩珍道：「其他堂區的朋友都問我：為什麼你們的感情維繫得這樣好？」

童年點滴，至今銘記

憶苦思甜，佩珍回憶中的太古樓日子是雖然窮卻活得開心，像天堂一樣。地方拆掉了很可惜，佩珍感慨太古樓的第二、三代沒法親身體驗那種野孩子一樣自由自在的生活。說起兒時的玩意與樂事，佩珍的女兒及外孫像聽故事一樣聽得津津有味。她說：「現在的人玩電腦，我們小時候卻用腦創作許多好玩的遊戲，屋與屋之間就是我們的遊樂場。」說起兒時玩意，在教堂旁的草地打球、晚上捉迷藏、爬樹、彈波子、踢毽……佩珍就有說不完的故事。

自小受洗，佩珍與太古樓小孩的信仰隨著步參加慕道班、聖詠團而日漸成長，明神父的教誨依然常在腦海，尤其他的謙遜和愛心。她道：「他就像一位來到我們生活的聖人，仿似耶穌一樣。」記憶中的身高六呎的明神父永遠黑長衫一道，手持煙斗滿面笑容。太古樓培養下來的信仰基礎，其後在聖母軍、其他堂區甚至下一代都得以繼續茁壯，令佩珍常懷感恩。

我敬愛的明之剛神父

馬兆桂

當我收到太古樓之友籌委會邀請我分享明之剛神父生前的生活點滴之後，令我深感惶恐，因籌委或太古樓之友內有很多長輩比我更有經驗分享明神父的往事；憂慮未能勝任將明神父的珍貴生活點滴一一表露，但為了對明神父的懷念及致敬，將我對明神父的深刻印象及回憶，樂意與大家分享：-

當我八、九歲任輔祭時，明神父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被煙斗薰黃鬍鬚的萬能博士。每天彌撒後，他會駕駛他的福士甲蟲車周圍探訪教友和病者；他還會修理自己甲蟲車、整理花園等。週六我們〔輔祭〕會跟隨他到黃竹坑瑪利灣學校舉行彌撒，當時這便成為我們的好節目，因可以坐他的甲蟲車。

逢主日在太古樓舉行彌撒之後，他會長途跋涉到西環乘坐街渡到南丫島傳教。當時並沒有故定地方舉行彌撒，只是在教友的家內舉行。有時彌撒後教友們會熱情地招呼明神父和輔祭到他們家中吃飯，還「劏雞殺鴨」非常豐富；我們是非常樂意及渴望跟隨的，因當時一般家庭並不富裕，難得「有餐好嘢食」；而我因次數多了，還得了一個花名「肥佬桂」添！

因南丫島沒有固定地方舉行彌撒，聰慧的明神父找到一個小山崗，興建了一所只有兩個課室的小平房來作學校，讓當地的小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但因身處山崗，沒有自來水供應，明神父有見及此，和附近的一位教友商議好，由他家裏的井引水到學校，由明神父及年長輔祭們的帶領之下，我們由西環運載喉通及一切用具到山崗，開始這項非一般的工程，在明神父的汗水及大家的努力之下，用了一個暑假的時間便完成了，而這就是南丫島露德聖母學校的前身了。

明神父離開自己的父母，飄洋過海，隻身來到語言不同及文化背景不同的香港傳教，還細心觀察到當時傳教區—南丫島的實際需要，建設基本的設施讓當地居民接受教育，處事親力親為、任勞任怨。在天主的帶領下，有幸認識到這位慈祥的長者，在他身上讓我看到基督的臨在，可惜當日的我蠢鈍無知，未能受聖神的恩賜，跟隨明神父獻身侍主，但他的獻身侍主的精神已根深蒂固的刻在我的心內，我會持守這信仰，努力侍主愛人，傳揚福音，讓天主的愛福佑普世萬民。

明之剛神父對我的影響

口述：盧麗霞 / 撰文：謝桂馨

今天的我懂得和人分享，珍惜食物，熱心侍主等，都是受了一位我敬仰的人影響，他就是明之剛神父。

回想1952年春天，我在鋼線灣（我在國內來港的落腳點）遇見了在那裡傳道的他。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個奇怪的人，因他身形高大和蓄了鬍子。因為他，我們一家接受了主的揀選，學習道理，並於同年12月24日領洗，加入了主的大家庭。

我們一家在1954年搬往太古樓居住，正式開始了教友生活，我這麼說是因為那裡有座教堂，給了我機會善盡教友本份。就因為這樣，我接觸明神父的機會多了，在相處的時間不單消減了我對他的那份恐懼，更加添了我對他的認識和了解。原來，他是個很有愛心，樂於助人的神父。很多時，他拿出口袋裏最後的一分一毫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對於痲瘋者的不介懷及獻出關愛精神更值得我們仿效。他在講道時更訓勉我們要懂得寬恕，做事要無愧於心及要遠離魔鬼。

身為露德聖母堂的主任司鐸，明神父除了傳揚福音外，也為貧困的教友在各方面給予資助，他聯絡了一些慈善團體給我們發放救濟品及贈醫施藥。平安夜更播放西方電影，讓我們在參與子夜彌撒前有個歡樂的聚會，在聖誕節期間又為小朋友舉辦聯歡會，使他們擁有快樂的童年回憶。那時，生活平淡的小孩，竟然有機會往銀鑽灣宿營，明神父真是居功不少，他亦成立了青年會，給予青年們參與堂區以外的表演機會，擴闊了大家的眼界。

我們這群教友不只懂接受施予，亦會在行動上作出回應。大節日一到，大家便協助清潔教堂和聖母山。亦有教友參加了詩歌班，用歌聲去讚頌上主，參加聖母軍的兄弟姊妹便協助各種堂區內的工作。

今後，我亦會繼續善盡教友責任，事事依賴上主，凡事感恩，時常祈禱，特別是為在煉獄中的靈魂。信仰使我堅強，亦常蒙主恩。

最後，我亦為能在太古樓生活，成長及認識到一班到現時還有聯繫的朋友而謝恩。那時，大家確實過着不覺窮困但快樂的日子，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難忘生活方式，我當然不會把它忘記！感謝天主！

滿臉笑容

口述：梁有伴 / 訪問及撰文：周嘉琪

婚後便搬離太古樓的梁有伴，嘴裡總說對太古樓的往事已忘卻得七七八八，但是說著說著，昔日的快樂片斷又慢慢地重組起來。

「我是聖華學校第二屆畢業生，那時大概是五十年代吧。」梁有伴牢牢地找緊記憶說：「讀書時代我參加了聖母軍，有機會跟著明之剛神父到處探訪、傳揚福音。探訪中見到不少非教友，他們也都願意信奉主，很令人鼓舞。」

因為聖母軍的緣故，有伴跟明神父的接觸多了，印象中他是個常帶著笑容的快樂人：「每次看見他都是笑臉迎人的，印象中他大公無私。還記得有一年爸爸病了，需要用錢。爸爸當時是在納匝肋印書館工作，在沒有其他辦法下，我們去了找明神父。他聽到我們的需要，沒有一點推辭便立即把錢給我們，我們一家也十分感激。」

除此以外，太古樓給有伴的回憶都是美好的，她說：「小時候最開心就是聖誕節，參與出遊，參加子夜彌撒，還有大伙兒到聖堂外的空地看露天電影。」有伴嘴角掀起微笑，趕快地說，彷彿回憶會再一次匆匆的溜走：「彌撒過後，便回家吃宵夜，那時家家戶戶都一早準備好食物，吃得肚子暖暖飽飽的。」

明神父頌

謝桂馨

明白事理樂助人
之剛神父顯愛心
剛毅不屈傳道去
神恩引導播種人
父慈容貌繫眾心

明之剛神父 — 我的模範

謝桂賢

「瑪利亞把一切默存於心，反覆思量。」（路2：19）總覺得慈祥的明之剛神父就像聖母瑪利亞一樣，常帶著微笑，穿著那清潔但殘舊的白色工作服，默默地打理他的園圃，其中有開得燦爛的向日葵，驕傲地朝著太陽，展露著笑容；每天晚禱後明神父愛坐在辦公室裡，手拿煙斗，吸一口煙，默默地細心聆聽公公婆婆閒話家常。他雖說話不多，卻為我們立下了好榜樣，成為我們的典範。

明之剛神父已離開我們三十年，現讓我分享他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F – Friendly (友善的)
R – Respectable (受尊敬的)

R – Resourceful (機智的)
E – Efficient (效率高的)
N – Noble (高尚的)
E –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

C – Christian (有基督精神的)
H – Holy, Humble, Hard-working, Humorous & Helpful
E – Excellent (傑出的)
V – Valuable (珍貴的)
A – Admirable (可欽佩的)
L – Learned (博學的)
I – Irresistible (無法抗拒的)
E – Environmental (環保的)
R – Responsible (負責任的)

「尋找明之剛神父的足跡」
法國朝聖之旅

謝麗蓮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教友

香港露德聖母堂及太古樓之友舉辦了一個名為「尋找明之剛神父的足跡」法國朝聖之旅，出發前三個月，朝聖之旅顧問陳志明副主教為我們舉行三次聚會，亦邀請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龐樂培神父講述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歷史，精神和貢獻。

明之剛神父出生於法國博普雷歐一個農民家庭，他在1935年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1942年晉鐸，1946年到中國，獲派駐廣州石室教堂和石龍痲瘋病院工作，1952年來港，服務於薄扶林太古樓村內的露德聖母堂，長達19年之久，其間他深受村民高度讚揚，1971年，明神父出任香港仔聖神修院神師時，更深受學生愛戴，堪稱桃李滿門，1980年，他出任西環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其時他雖然已屆古稀之年，但他仍然致力於關懷社會的服務。1981年4月，明神父剛休假回法國，途經泰國，本擬探訪當地難民，豈料卻遇上車禍而逝世，終年72歲，遺體運返香港，安葬於跑馬地天主教墳場。

我們的團員太古樓之友，都認識明神父，他們深深感受到他的愛，和他的無私奉獻。他全心全意地服務教友，默默耕耘，不問收獲的基督精神使太古樓之友的家庭關係良好，他們互相幫助和接納，活得很快樂。他亦曾收養孤兒和照顧香港的痲瘋病人。遇上節日時，他亦安排聯歡會，話劇或電影等，完全融入中國人的社會，使太古樓之友視教堂是他們的家，因此清潔教堂也是他們的責任。每個晚上，他們一起做晚課，宗教氣氛十分濃厚。明神父喜歡耕種，尤其是種木瓜，那當然會與教友一同分享，使他們口福不淺，共享天主的愛。

我們團員共分為瑪竇、馬爾谷、路加和約望四組，陳副主教鼓勵各組組員於出發前熟讀自己組別的聖經部份，多祈禱，好好準備這次朝聖，他亦於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前來送行，祝福我們，鼓勵我們要為中國教會祈禱，亦提醒我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的身份。

今次行程的首站是露德，我們朝聖團的神師葉定國神父認為是一個最好的安排，因為在露德的首三天，可以說是一個小避靜，讓我們有充分的祈禱時刻去洗滌心靈，更可養足精神去其他地方朝聖。在苦路聖山上拜苦路的時候，

葉神父提醒我們，苦路聖山的苦像是按人的比例而造成的，我們拜苦路時，不妨留意苦像的形態和眼神，好讓我們能投入當時耶穌的心神，亦可淨化我們的心靈，多做補贖。

朝聖團在苦路聖山上拜苦路

當年聖母引領聖女伯爾納德到泉水，今天聖女伯爾納德亦領我們到露德去浸聖水，那一刻的交托，那一刻的信德，真是可以洗滌心靈，使靈性生活成長。我們更應該有感激之心，讓自己能處身於聖母無玷始胎大殿中，四周的玻璃窗畫展露聖母顯現給聖女聖伯爾納德的情況，提醒我們聖母要求人們懺悔及為罪人改過祈禱。玫瑰大殿內的15端玫瑰經奧蹟，加深我們對誦念玫瑰經的體會，默想聖母與基督的一生，分享祂的平安，認清自我和信仰的使命。

葉定國神父於聖母岩舉行感恩祭

在露德，病人與健康的人一起參與聖體與燭光巡遊，沿途誦唱聖詠、誦唸玫瑰經，萬人聚集在一起為世界祈禱，場面宏偉兼感人，使我們感覺到處身於教會的大家庭中，互相燃點信仰心火，我們更認識到要不遺餘力地傳揚福音，以愛德的行為作見証。

聖伯爾納德是一個磨坊工人的女兒，她是一位牧羊女和女傭，但聖母瑪利亞於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期間曾18次顯現給她，聖母透露了她是「始胎無玷者」，聖女曾說過，她之所以被聖母揀選，是因為她貧窮和無知。

我們參觀了「磨坊」（這是聖伯爾納德出生的地方）和「黑牢」（她十多歲時的居所），當中都可以感覺到她家庭的困境，聖女的單純，對聖母的信任和交托，提醒我們要全心全意去愛天主，不求己益，放下私慾，天主的愛，時時刻刻都會臨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到達里修 — 聖女小德蘭的故鄉，參觀加爾默羅隱修院。從錄影帶中，我們看見隱修女們活潑開心的笑容，明白她們可以過著遠離物慾的生活，而仍然深愛天主。我們跪在聖女聖髑旁祈禱，體會她的恩寵，反省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聖女小德蘭大教堂座落於山上，牆上的壁畫提示我們，信德和愛德是最重要的，小德蘭右手聖髑（她是用右手記錄她的靈心小史）和她父母的聖髑同放於地洞聖堂內；小德蘭父母的聖髑亦放在香港聖德肋撒堂，有形的聖髑提醒我們聖人在世的芳表，小德蘭父母能成為真福，並不是其女兒是大聖人，而是他們的教導和培育，才是小德蘭踏上成聖之路的關鍵。

安放在加爾默羅隱修院的聖女小德蘭聖髑

我們在小德蘭的故居，看見她的遺物如：床、衣櫃、玩具、餐具、頭髮和衣服等等，可以感受到她是父親的愛女，她是在愛的環境中成長的。

聖彌額爾山

公元708年，主教在聖彌額爾山上建築了聖彌額爾修道院，從此，此地成為重要朝聖之地，我們參觀了這個偉大工程，可惜今天只有六位隱修士居於此。

五月三十日是我們這次朝聖之旅最重要的日子，我們到達博普雷歐，一個我們從未聽過的地方，這是明之剛神父的家鄉。到達時，我們遠遠看見歡迎我們的海報，教堂亦鳴鐘以表歡迎。

門上的歡迎海報

七十多位歡迎人士中包括明神父的弟弟 Alphonse、弟婦、姪兒、姪女、姪孫、曾姪孫、神父、教友、市長、市政廳官員和七位從中國來法國學習的女初學生，他們笑容滿面，拍掌歡迎。在歡迎會上，戴唯微神父（巴黎外方傳教會副會長，曾在香港教區服務，亦是我們當地顧問）替我們翻譯。

明之剛神父的家人

我們的團長陳忠明先生說明我們來臨的目的，是想明瞭明之剛神父成長的環境和讓人認識明神父和他的傳教精神與德行。Alphonse說歡迎詞時，眼帶淚光，場面感

明之剛神父的家人及當地教友歡迎朝聖團到訪

動，令四周的人忍不住想流眼淚，我們的團友都很感動地上前擁抱他。其後 St. Martin's Church 主任司鐸介紹他們教堂的歷史。從幻燈片中我們得悉明神父龐大家族的一些生活片段。

我們參觀明之剛神父家族的農場（le Chataignier），這是明神父出生、成長和工作的地方。現今已沒有人居住，只見一大片荒廢的田野，長滿野草和破舊的石屋，但可以想像明神父處於這一大片廣闊農田中，與天主相遇，肯定自己的傳

明之剛神父的弟弟在看照片

明之剛神父家族的農場 Le Chataignier

1957年的明之剛神父和他的兄弟及妹妹

教聖召。

透過接觸明神父的家人，我們得悉明神父的妹妹是修女，姪兒也是傳教士。Alphonse 告訴我們，明神父很喜歡聖人de Monfort 主教的德行，深受他的影響。那時候博普雷歐的青年人很遵守

教規，喜歡做神父，修士和修女，特別喜愛傳教士。入修院的年齡通常是十多歲，但明之剛神父於二十四歲時才進入修院，是屬於高齡修生。其實他的父母從來沒有反對過他做傳教士，只是他覺得他有責任分擔父母的工作，他認為打理農場是他應有的責任。他於二十歲時當兵，完成他對國家的責任才進入修院，可知他是一位孝順和有責任感的兒子，亦是對國家有承担的人。

博普雷歐聖伯多祿堂外貌

明神父在1942至46年服務於博普雷歐聖伯多祿堂為副本堂，現在有些教友還沒有忘記他呢！他們告訴我們他是一位開朗活潑的人，喜歡踢球和游泳，亦曾在危險時救過遇溺的青年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盡力保護青年教友。

博普雷歐市長接待朝聖團

博普雷歐的教會和市長很重視我們朝聖團的到訪，每當我們到達教堂參與彌撒時，教堂都鳴鐘，Alphonse 都會奉獻一個世界地圖膠球於祭台前，祭台上亦掛上明神父的大海報，除了明神父的家人，教友和七位中國女初學生，市長和市政廳官員亦參與彌撒。

葉定國神父、戴唯微神父與 St. Martin's Church 主任及助理主任司鐸在 St. Martin's Church 共祭

法國當地報章 Courrier de l'Ouest 及 Ouest France 均有報導朝聖團到訪

市長亦於翌日聯同市政廳官員帶領我們參觀舊城區和城堡外

觀，沿途亦有記者隨行。當地報紙亦刊登我們的照片和報導我們的到訪。市長於市政廳設歡迎會，表達他很珍惜和重視這次與中國教友的相聚，強調法國教會的重要性和要為世界和平合作；他更承認明之剛神父是這方面的重要橋樑。

朝聖團成員與當地教友一同參與感恩祭

我們離開博普雷歐時，興奮的心情還未能立刻平伏就到達沙特爾聖母大教堂。我們很幸運，亦受到天主的眷顧，因為我們參觀巴黎聖母院時，剛巧遇上每月舉行一次的刺冠朝拜；於聖心教堂時，又遇上明恭聖體；於聖母顯靈聖牌教堂，更遇上神父舉行感恩祭。

前太古樓聖華學校老師 — 郭修女，專程來到聖母顯靈聖牌教堂與太古樓之友會合，真是他鄉遇故知呢！參觀巴黎外方傳教會時，總會長接見我們，帶領我們參觀會院。得悉他們的傳教士遍達全世界，在香港的服務也很偉大。午餐時他們還為我們團員舉行生日會呢！

太古樓之友與郭修女於巴黎相遇

今次朝聖，我們除了認識香港的明之剛神父，亦認識到法國的明之剛神父，透過他的親戚和當地教友的分享中，我們知道明神父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他無論處於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他都是盡心為教友服務，透過服務，他影響教友，使教友更接近天主，他按照天主意旨生活及工作，活出天主之國的神父。我們應該感謝天主，因為他給了香港一個具有聖人特質的神父。